

## 大运河与扬州文化基因研究

李 燕 李 明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扬州与运河息息相关,扬州文化也有着深厚的运河底色,其间虽几经沉浮,但不失其浓郁之底蕴。当前,在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扬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保护、传承、利用好扬州文化,对于建设好大运河文化带、弘扬大运河文化、讲好大运河故事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回答什么是扬州文化、如何传承扬州文化等问题,就需要厘清扬州的历史文脉,从多个维度来解读分析扬州文化形象,进而提取并传承扬州文化内在的文化基因。

**【关键词】**扬州文化;历史脉络;文化形象;文化基因;大运河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5-0122-09

## The Grand Canal and Yangzhou Cultural Genes

LI Yan LI 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and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Yangzhou culture have ushered in a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y. Protecting, inheriting and making good use of Yangzhou culture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at carrying forward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telling the stories of the Grand Canal and building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Yangzhou culture and how to inherit Yangzhou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Yangzhou culture,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cultural image of Yangzhou from many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extract and inherit the internal cultural genes of Yangzhou culture.

**Key words:** Yangzhou culture; historical line; cultural image; cultural gene; the Grand Canal

扬州历史堪称中国历史之缩影。明代《万历扬州府志·序》云:“故以民物之隆替候维扬之盛衰,以维扬之盛衰候天下之否泰。”<sup>①</sup>近代学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有类似评价:“扬州一地之盛衰,可以觐国运。”<sup>②</sup>历史上的扬州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扬州文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过重要贡献。扬州曾数度兴盛,也曾几番衰落,全与大运河的兴衰紧密关联,因而有着“中国运河第一城”之称。21世纪,扬州迎来了新的振兴机遇:2002年,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东线

[收稿日期] 2020-03-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19ZDA187)

[作者简介] 李燕(1970—),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学;李明(1973—),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农村文化建设。

① [明] 杨洵修, [明] 徐奎纂:《万历扬州府志》, 见于《中国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辑·第一辑》, 凤凰出版社, 2014年, 第307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613页。

工程;2007年9月,扬州被确定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大运河文化工程带建设作出重要部署;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再次对扬州大运河文化保护情况进行视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大运河由南至北途径三十五座城市,唯有扬州是与大运河共同成长、休戚与共的城市。扬州也是我国大运河河段开挖最早、航道最稳定、文化遗迹遗存保留最多的城市,因此在当下理应争做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排头兵”,深耕细作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承担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使命。基于此,本文试在厘清扬州文化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从多个不同的维度来认识 and 解读扬州文化形象,并提取扬州的内在文化基因,以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扬州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贡献绵薄之力。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扬州文化的历史脉络

作为国家首批认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扬州拥有着深厚、悠久的历史底蕴。扬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和历史的积淀,因此要回答什么是“扬州文化”,就必须先厘清扬州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历史上的扬州在名称、地理区位和行政区划上都发生过巨大变化,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过很大改变。从名称上看,历史上的扬州曾有过“邗越”“广陵”“江都”“维扬”等多个称谓,其最初且最为人知的“扬州”之名出自《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sup>①</sup>之说,“淮”指淮河,“海”指东海;从地理区位和行政区划上看,当时的扬州作为古中国九州之一,“沿于江海,达于淮泗”<sup>②</sup>,其实际地理范围涵括了今天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岭南等区域。而今天的扬州是江苏省辖地级市,位于江苏中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下辖邗江区、广陵区、江都区、宝应县等4个区县,代管高邮市、仪征市等2个县级市。扬州文化在中国地域文化发展史上占据十分显赫的地位,在多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繁荣的地域文化,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 (一)萌芽期

早在距今7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人便在扬州高邮湖区劳动生息,种植水稻,其原始稻作文化被誉为“江淮文明之花”<sup>③</sup>。春秋时期,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扬州隶属古邗国地,称“邗越”;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吴王夫差在今扬州市西北的蜀冈尾闾修建邗城,并开凿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水系,《左传·哀公九年》中载有“吴城邗,沟通江、淮”<sup>④</sup>,是为扬州建城与大运河的最早记载,自此扬州的兴衰与大运河紧紧联系在一起。后越灭吴,楚又灭越,楚怀王改邗为广陵,取该地“广被丘陵”之意。秦统一后,设广陵县,属九江郡。秦汉之际,改广陵为江都。

### (二)首次繁荣与衰落

汉代先后在广陵建都的诸侯国有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西汉初期,吴王刘濞建都广陵,他为流贯财货、繁荣经济,于广陵城东北20公里茱萸湾处新开运盐河,“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以此奠定了盐业在扬州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加之以长江为中心、运河为纽带、湖泊为依托、淮河为终结的水利网络初步完成<sup>⑤</sup>,扬州得以进入历史上的第一次繁荣时期。当时的扬州一度成为东南文化的一个中心,南北朝鲍照称之为“才力雄富,士马精妍”。

三国时期,魏、吴两国战争不断,扬州作为江淮一带的兵家必争之地,屡经战乱,数次沦为“芜城”,周

①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第65页。

② 《尚书》,第65页。

③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④ 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下册)》,中华书局,2012年,第2289页。

⑤ 夏梅珍:《“才力雄富,士马精妍”——兴盛的汉代扬州》,《扬州文学》2004年第S1期。

遭的高邮等地更是长时间沦为隙地,在地名的多次更改中可管窥频仍的战乱对该地的影响。西晋政府在此设广陵郡,东晋时期改广陵郡为海陵、山阳两郡,刘宋时期合为南兖州,北齐与北周其名又有更改,称东广州与吴州。南北朝时期,大批北方移民南迁涌入广陵,南北文化在此得到广泛交融,从而为扬州经济与文化恢复奠定了基础。

### (三)扬州的再次兴衰

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改吴州为扬州,置总管府于丹阳(今南京)。隋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下令“于扬州开山阳渚,以通运漕”<sup>①</sup>,作为山阳与扬州的连接线,早期山阳渚的开凿是为了方便出师行军,之后成为了当地航运重要的组成部分。到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永济渠,其后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sup>②</sup>。大业六年(610)冬,隋炀帝再“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东巡会稽”<sup>③</sup>。至此,长江、黄河、淮河、海河以及钱塘江五大水系被一条纵观南北的大运河联结起来,扬州藉此成为“南北大冲,百货所集”之地,逐步成为东南经济文化中心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埠。

唐代的扬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繁荣,《旧唐书》曰:“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sup>④</sup>日益南迁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为扬州成为南、北和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提供了契机,以粮草、盐铁等大宗货物的运输与转运为核心,使扬州一跃成为与广州、泉州与交州齐名的东方大商港。尤其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首要仰仗东南地区财赋,扬州遂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大都市,不仅商业发达、手工业兴旺,而且农业繁盛、文化昌荣,对此清学者顾祖禹总结为:“富庶,甲于天下,自唐及五季称为扬一益二。”<sup>⑤</sup>时扬州不仅是全国各地商品的“东南第一大都会”,还是中外交流的文化集聚地,世人称“天下文士,半集维扬”。日本先后组织并派出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九次直接在扬州登陆或以扬州为重要中转站,远赴日本的高僧鉴真,十年间六次跨海东渡日本传戒,其中以扬州港口作为起点便有三三次之多。宋代淮扬运河不断扩建,通航能力不断提高。北宋时期,扬州再次占据了东南沿海商贸文化发展的中心位置,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人为世人创作了大量关于扬州的不朽诗篇。南宋时期,扬州成为抗金、抗元前线,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道:“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淳熙三年金兵南侵以来,繁华的扬州屡遭兵燹,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废池乔木”“戍角悲吟”。

### (四)扬州的三度起伏

尽管屡遭兵祸,但在隋、唐、宋三代的苦心经营下,淮扬运河业已形成了排引得当的工程体系,隐隐有国之命脉的迹象。其后,黄河南下夺淮,运河几经兴废,到元代,大运河开始实施“弃弓走弦”的航运路线,由北京直达杭州,历经数次的整治,大运河再次实现了南北通衢的格局,漕运恢复后扬州迅速繁华起来<sup>⑥</sup>,到扬州经商、传教和定居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日渐增多,极大促进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但海道的使用使扬州的交通地位有所下降。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但是国家的经济中心依旧在南方,“京都百万口抱空腹以待江淮灌输之粟”“国家紧要命脉,全在转运”<sup>⑦</sup>。扬州依靠优渥的地理区位,第三次成为全国商贸文化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彼时,扬州的商业形式主要以两淮盐业专卖和南北货贸易为主,其盐税收入能够与粮赋收入齐平。同时,扬州在玉器、漆器、刺绣等传统手工艺品的制造上也具备极高的水准。此外,在文化戏曲方面,

① [唐]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25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5636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5652页。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2013年,第4716页。

⑤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870页。

⑥ 王韬:《大运河的文化意象》,《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⑦ 王在晋:《通漕类编·序》,明万历刻本,第一册,第1页。



扬州城更是出现了大批小说、杂剧名家。明朝灭亡后,几世繁华的扬州城遭清军屠戮,死者数十万,史称“扬州十日”,堪称扬州发展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

清代以降,运河之地位尤胜前代。扬州在清廷休养生息政策的背景下再次发展起来,在康乾时期迎来了历史上第三次繁荣时期。当时扬州占漕运、盐政、河务三大要政之地利,“动关国计”,康熙和乾隆六次“巡幸”。作为当时世界十大城市之一,整个扬州城的人口数量突破五十万,扬州文化发展也达到了又一个顶峰,如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以阮元、汪中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此外,当地的雕版印刷、清曲、扬剧等均属全国一流,文化领域的勃发使扬州拥有成为当时全国文化中心的底气。

清咸丰五年(1855),是运河水利史中极其重要的年份,该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运河山东段淤塞,大运河航运被拦腰截断。清同治年间(1862—1874),漕粮改以海运为主,仅十分之一仍由河运,淮盐则改由铁路转运,至此,扬州汇聚漕运、盐政与河务的优势已三不存二,随着漕运中心的转移与上海的崛起,扬州经济与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在之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三进三出”扬州城,对扬州造成了沉重的影响。待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探索恢复运河漕运,但是运河疏通需要花费巨额资费,这对于清末政府是难以承受的,并且漕运相对于海运已经没有了优势。因此,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令废止漕运。

此后,扬州经济文化陷入了长期的衰落。民国元年(1912)1月,废扬州府,置江都县。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该铁路贯穿江苏境内且与苏北运河平行,货物流向一致<sup>①</sup>,因此,扬州的交通枢纽地位因铁路的分流而彻底丧失,商业、手工业急剧衰落。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对常年淤积的里运河河道进行了清淤、疏浚,对于已经破损严重的堤防进行了重新整修,采用浆砌块石或干砌块石护坡的新式技术,加固了里运河河道两岸的护岸埝工与闸洞护埝,运河转向主要发挥调节水流、防洪蓄水之用。“国家不幸诗家幸”,民国时期扬州文化艺术领域名家辈出,有朱自清、刘师培、李涵秋、贡少芹、张丹斧、陈含光、潘月樵等。

### (五)新中国成立以来扬州的再发展

1949年1月,江都县城(扬州)解放,设置扬州市。国家和政府重视恢复国民经济,着力治理运河,扬州先后修筑了万福闸、运盐闸、金湾闸、芒稻闸、太平闸和江都水利枢纽等现代化水利工程,大运河重新恢复了生机。1958年大运河建设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分期建设,保证重点,依靠群众”的整治方针<sup>②</sup>,京杭运河扩建工程取得了初期效果,扬州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得以恢复,许多艺人和工艺名师陆续地回到扬州,扬剧团、话剧团、扬州评话团等艺术团体先后成立,漆器生产作坊很快开业,许多园林也得以修复。“文化大革命”期间,扬州许多文化遗产遭受严重毁坏,扬州文化再度面临危机。改革开放以后,大运河大规模整治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启动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推动了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大运河又一次焕发了生机,扬州经济文化也得到快速发展。

进入21世纪,大运河正以一种新的身份和形象重新归来,扬州文化也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2002年,扬州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水源地。自此,大运河的历史功能得以被挖掘,其文化底蕴得以被激活,其文化品味亦得到了有效提升。2007年9月,扬州被确定为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牵头城市;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2月,习近平主席指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在同年9月进一步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再次对大运河文化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视察,并对扬州的历史文化底蕴给予了高度评价;2021年6月,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建筑,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

① 倪玉平:《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② 《新中国水运事业大事记(1949—1984)》,《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5期。

通过梳理扬州文化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出,其经历之坎坷,全国罕有其匹,先后经历了先秦萌芽期——汉代首次繁荣与衰落期——隋唐时再度兴衰——明清时期三度起伏——新中国的再发展期。扬州文化的兴衰与大运河的兴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运河兴则扬州兴,运河衰则扬州落的特有现象。

## 二、多维度下的扬州文化形象

文化形象,作为一套系统性的文化表述体系,其既可以是文学式的,亦可以是非文学式的。它的生产与再生产,实则伴随着形象塑造与建构认同的复杂过程。就此而言,文化形象是现实与历史交融、重组、互构的产物。从功能论的角度看,文化形象既可以被视作激发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在维持民族身份认同、建构社会记忆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时空维度、文化主体及社会群体视角来观察,扬州在数千年的文化变迁中曾展现过不同的文化形象,包括:水文化维度下的扬州运河文化形象、地域文化维度下的扬州江南文化形象、经济形态维度下的扬州盐商文化形象、二元文化维度下的扬州城市文化形象、诗词文化维度下的梦想之地文化形象。要全面地认知和理解什么是扬州文化,就需要从多个不同的维度来认识 and 解读扬州文化形象。

### (一)水文化维度下的扬州运河文化形象

“水文化”是以水为核心、以水事活动为载体、以人水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文化形态。扬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自古就以水文化而闻名。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云:“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sup>①</sup>

大运河孕育于扬州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其对扬州的兴起和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助力扬州创造出了独特的“水乡”文化生活,使扬州在经济与文化方面成为中国运河城市的典范,扬州也被誉为“大运河原点城市”“中国运河第一城”,由此大运河文化形象也就成为扬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象之一。

水文化的实质就是以人为主体的,以水为客体,并在人与水不断协同联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能把扬州文化等同于水文化,但可以认为扬州自诞生起就拥有水文化的基因,最早的扬州先民就生活在沮洳之地采集渔猎,扬州文化中所特有的绵柔、流动和圆融性即来源于此。发于春秋时期、兴于隋唐、盛于宋元的大运河更是扬州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大运河的原始功能是运输,人与物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sup>②</sup>。扬州人民的生产、生活无不与大运河相关联,大运河进一步塑造并强化了扬州的文化基因,扬州运河文化形象也得以树立与稳固。

### (二)地域文化维度下的扬州江南文化形象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总和<sup>③</sup>。因此,地域文化的差异,也体现为不同地域中差异化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进言之,辨别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需要深入洞悉掩藏于某一区域群体内部的深层次的文化人格。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扬州文化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富的人文内涵以及极为鲜明的文化属性。

扬州的地域文化常被统称为“淮扬文化”。有学者认为,习惯上扬州地域指江淮之间的大片区域,扬州文化应指以扬州为中心、为表征的江淮流域的文化现象<sup>④</sup>,不过在历史上,扬州因长期的辖属关系和巨大的影响力而被视作江南文化的代表。汉唐以来,江南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均可看到扬州城市建设的影

① [东汉]刘熙撰,[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0页。

② 卢勇、冯培:《20世纪以来大运河水利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中国农史》2019年第5期。

③ 张凤琦:《“地域文化”概念及其研究路径探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④ 张梦琪:《淮扬地域文化的历史特色及其成因》,《理论观察》2017年第3期。

子,体现着扬州对江南地域的辐射与影响,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谓,宋时民间则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明清以前,扬州一直作为江南地区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扬州“江南”的概念根深蒂固,自唐以来很多歌咏江南的诗词都是描写扬州的,例如唐杜牧著名诗篇《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人们对于扬州江南文化形象的认同,既不是单单地理意义的,也不是气候和语言上的,更多是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

### (三)经济形态维度下的扬州盐商文化形象

扬州受水之恩,因运河而兴,孕育了极具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进而,扬州城所具备的文化特征,也逐渐在这一特色化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被形塑出来。历史上的扬州以商业尤其是盐业经济闻名于世,盐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占据了扬州经济的主导地位,所以,“扬州繁华以盐盛”的说法古已有之。扬州盐业起于西汉初年,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并开凿运盐河(茱萸沟),将海盐集中运到扬州,再分运各地<sup>①</sup>,之后兴于唐宋,鼎盛于清中前期,乾隆时期清代扬州盐业经济进入了空前繁荣阶段,两淮盐运使司衙门和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在扬州皆有设立,垄断两淮盐业的八大商总也悉数汇集于扬州,据学者何炳棣先生估计,1750至1800年间一名盐商每年可获得高达500万两白银的利润<sup>②</sup>。在如此丰厚财力的驱动下,两淮盐运使衙门和盐商于新城南河下一带和西北郊瘦西湖沿岸修筑许多精美的园林,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评价道:“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轻。”<sup>③</sup>

盐商对扬州经济、文化、园林建筑 and 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sup>④</sup>。盐商积极兴办学校、出资建书楼、延揽学者进行学术研讨、编辑出版各类书目、收藏古玩字画等。上述虽是盐商为提高自身名誉之举,但客观而言,这一实践活动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形成了著名的扬州盐商文化。当然,历史上的扬州还形成了航运业、手工业、服务业等众多经济形态,在此基础上先后衍生出漕运文化、百工文化、饮食文化等众多文化形象,不过以城市贡献度、文化影响力及历史地位而论的话,盐商文化乃是扬州最为代表性的经济文化形象。

### (四)二元文化维度下的扬州城市文化形象

二元文化即城乡二元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在古代这种差异通常表现为城市的商业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当下城乡二元文化除体现出城乡之别以外,还常反映出现代与传统、先进与守旧之间的对立。

扬州的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推动了扬州城市生活向精致化发展,与生活有关的各类手工业和服务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漆器、玉器、雕版印刷、剪纸等体现了扬州地方手工艺的高超水平;扬剧、评话、清曲、弹词等表现了扬州曲艺的艺术特色;淮扬菜、三把刀、早茶与洗浴文化体现了扬州饮食休闲文化的精致,这些共同塑造出了扬州以休闲消费为目的、以精致生活为特色的城市文化形象。有学者认为,扬州文化的城市性质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其高度发达的市场基础以及商业文化,源自其独特的区位优势 and 交通结构<sup>⑤</sup>。也正因如此,在近代中国整体的乡土文化与扬州相对发达的城市文化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扬州文化不可避免地被传统社会视为一种怪异的文化现象。轻扬、势利、俗气也成为古人对扬州文化的主要印象。早在唐代,杜佑就在《通典》“扬州卷·风俗”中强调“扬州人性轻扬”<sup>⑥</sup>,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亦评价扬州为“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颇有些财力有余、教化不足之意味。

① 王乃祥、薛长顺:《扬州繁华以盐盛——兼议扬州盐业发展的历史作用》,《商业研究》1994年第9期。

② 何炳棣、巫仁恕:《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③ [清]李斗著,王军评注:《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89页。

④ 吴莉莉:《从〈扬州画舫录〉看两淮盐商对扬州文化发展的作用》,《史志学刊》2015年第5期。

⑤ 余大庆:《论扬州文化的性质及其现代意义》,《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8年第1期。

⑥ [唐]杜佑:《通典》卷182《州郡十二》,《钦定四库全书》第6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06d页。



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的扬州,其空间范围都包括了城市和乡村,因此扬州文化必然既包括城市文化、商业文化,也包括乡村文化、农业文化,而且受城市、运河、盐业等辐射影响,扬州地区的农业农村文化亦十分发达,只是常被古人忽视而难载于史料中。扬州高邮龙虬庄遗址的发掘,不仅证明了扬州在距今7500年前就产生了原始稻作文明,而且是同时期东南地区唯一处长江以北的稻作文化<sup>①</sup>。唐代中后期兴起的陂塘水利代表了时东南地区农田水利的高峰,仅高邮湖区数个陂塘就能“灌田数千顷”<sup>②</sup>。发展并成熟于明清时期的兴化<sup>③</sup>垛田农业系统和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先后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sup>④</sup>,前者还是江苏省第一个同时也是唯一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些既是扬州农业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扬州文化形象的重要体现,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解读扬州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 (五)诗词文化维度下的梦想之地文化形象

长期以来,普罗大众通过诗词歌赋对扬州产生了美好而丰富的想象,“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在大众心目中已形成了梦想之地与人间天堂的形象,因此文化昌盛,堪称群贤毕至、文采风流,世所罕有。

唐宋时期,扬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城市景象,吸引了众多文人骚客、贤人雅士前来游历,由此而生的颂扬扬州的古诗词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有关扬州的诗词已经造就了一种经典的扬州文化形象。据统计,以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为翘楚的唐代诗人,其创作的关于扬州的诗歌超过200篇。此外,有学者统计研究《全唐诗》《文苑英华》等存世的两万多首唐五代诗词后,发现吟咏扬州的诗歌有414首,涉及诗人人数更是高达158位<sup>⑤</sup>。扬州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积淀了丰厚的诗词遗产,改革开放后曾数次开展过整理、编译、校注、出版扬州古代诗词专著的工作<sup>⑥</sup>。

在诗人的笔下,扬州城被渲染成色彩缤纷、令人神往的繁华之所与梦想之地。其中的名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李绅)、“我梦江南好,征辽已惘然”(隋炀帝杨广)等,都展现了扬州文化的吸引力。唐代诗人张祜甚至在《纵游淮南》表达了希望死后葬于扬州的夙愿:“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概之,认识和解读扬州文化形象的任何一个维度都有其独特价值,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从整体上认识和理解扬州文化,需要从多维视角把握扬州文化的多元文化形象。

### 三、扬州“文化基因”的提取与传承

多元的扬州文化形象为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扬州文化提升了难度,对于如何保护好传承好扬州文化也提出了挑战。从文化基因视角探索扬州文化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所谓“文化基因”,其可

① 李民昌、张敏、汤陵华:《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②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2页。

③ 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兴化隶属扬州地区。

④ 卢勇、陈加晋、陈圆圆:《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年,前言第10页。

⑤ 王海雯:《唐五代诗词中扬州地名的文化意象与历史象征》,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9页。

⑥ 具体参见章石承、夏云壁选注:《扬州诗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扬州老年大学《扬州历代诗词》编委会编,李坦主编:《扬州历代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王鹤编著:《古代诗词咏高邮》,广陵书社,2006年;董玉海总编,冬冰主编:《长河有歌吟——大运河诗词中的扬州记忆》,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以被理解为从生物学“遗传基因”概念衍生、类比出来的新概念。它主要是指掩藏于各类文化呈现形式背后的,能够在历史时空的绵延中不断得到传承、发展的文化理念、精神内核以及一系列能够凸显文化本质属性的独特风格。从文化主导属性、文化识别属性等维度进行类型学的界分,文化基因又可以细分为三种:一是主体文化基因,二是附着文化基因,三是混合文化基因。可以预见,对于一种文化的守正、转化与超越而言,上述不同类型的文化基因一定扮演着各自关键的角色,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基因的谱系<sup>①</sup>。生物基因的提取是按照生物基因逆转录提取完成的,而文化基因的提取则是对各种相关文化遗产经过抽象分析和逆翻译得到核心文化元素的过程。

### (一)扬州文化的主体基因

首先,不言而喻,主体文化基因一定是建构地域文化属性,凸显地域文化呈现形式,标识地域文化价值功能的核心变量。对于一种文化而言,主体文化基因一旦缺失或消亡,地域文化特色便不复存在,文化也将无法传承。扬州文化的主体文化基因内在于各种扬州文化事象中,是扬州文化中能传承其文化内核的最基本单位<sup>②</sup>。从宏观角度,它发端、延续、沉淀在由7500年的地域史、2500年的建城史与大至东南一部、小至广陵区一隅的时空场域里;从微观角度,它产生、集合、浸润在扬州人的群体意识与文化记忆中。扬州文化的产生与兴盛皆是源自大运河,扬州文化与大运河兴衰紧密联系,没有大运河,以盐业、商业、手工业为基础兴起的经济活动、以水文化为母体而构建的文化体系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扬州文化的主体文化基因就是与大运河的开凿、维护、管理、航运等活动及由此产生并流传至今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相关的文化基因。大运河构筑了扬州人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塑造了包容、融合、流动和流通的文化素养。我们需要以包容的态度不断融合新的要素,在保持大运河的流动性和航运活动来实现货物、人和信息流通的基础上,通过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以实现文化资源的创生、流动与结构转型,从而促进扬州文化的复兴。

### (二)扬州文化的附着基因

其次,所谓附着文化基因,主要是指依托于某一特定的或可见的文化载体之上,能够良好地标识文化属性的文化符号。就文化的识别性而言,附着文化基因一方面承担了标识地域文化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这种“文化识别”,反过来巩固其本身的主体基因。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属于附着文化基因的文化载体。目前当地已拥有15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扬剧、扬州评话、扬州清曲、扬州剪纸、扬州玉雕、扬派盆景制作技艺、雕版印刷、谢馥春脂粉制作技艺等。有些物质文化遗产如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卢绍绪盐商住宅、汪鲁门宅等也属于附着基因文化载体的一部分。对于附着文化基因的传承,应突出文化符号植入效应,通过积极将附着文化基因融入到旅游、影视、数字创意等产业形态中去,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从而维护与提升扬州文化的多元与活力。

### (三)扬州文化的混合基因

最后,所谓混合文化基因,是指其并非某一地方社会所独有,但同样能有效呈现、彰显该地方在某一历史阶段社会事实的文化基因。混合文化基因虽然并不具备标识文化独特属性的功能,但其同样是地方文化基因库的重要构成,其有助于保持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生态平衡。扬州文化混合文化基因的文化载体主要包括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邵伯古镇、界首古镇、瘦西湖、个园等。这些文化载体都包含融合了丰富多样的物质与非物质、静态与活态的文化遗产,属于文化遗产的复合体。对于混合文化基因的传承利用,十分适用于文化生态保育模式,即培育适宜其生存的环境,在维护

① 席丽莎、刘建朝、王明浩:《城市多元文化的基因谱系及其价值化传承》,《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9期。

② 宋长善:《大运河江苏段的文化遗产构成与基因谱系》,《边疆经济与文化》2020年第8期。



物质文化载体的同时,保持混合文化基因的生命力与多样性<sup>①</sup>。

## 结 语

自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起,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城建历史过程中,扬州及扬州文脉之嬗递演进与运河发展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可谓因运河而兴,承运河之变,直至今日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群众基础。扬州文脉底蕴深厚、特色鲜明,虽几经盛衰起伏,但运河无疑是其最为厚重的底色,这是理解扬州文化的关键所在,也是扬州之所以为“扬州”的独特名片。“文以载道,成风化人”,当前,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家战略下,运河之畔的古城扬州再次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其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离不开文化的助推、加持和渲染。挖掘梳理数千年之扬州文脉恰逢其时,恰逢其势。我们理应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之条件,实现对扬州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弘扬运河精神,讲好扬州故事,展现扬州形象,以运河特色彰显扬州千年风华,并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发展中重建文化自信,再造扬州辉煌。

(责任编辑:李良木)

## [参 考 文 献]

- [1] 钱 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 [清]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 董文虎.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4] 赵昌智. 扬州文化研究论文集论[M]. 扬州: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08.
- [5] 樊树志. 历史与文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 [6] 李 斗. 陈文和点校. 扬州画舫录[M]. 扬州:广陵书社,2010.
- [7] 林惠祥. 文化人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8] 张金池,等. 京杭大运河沿线典型区域生态环境演变[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 [9] 冬 冰. 长河有歌吟——大运河诗词中的扬州记忆[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 [10] 高文麒. 江苏盐商文化[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 [11] 霍艳虹. 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京杭大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
- [12] 姜师立. 中国大运河扬州[M]. 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20.
- [13] 李民昌,张 敏,汤陵华. 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J]. 东南文化,1997,(2).
- [14] 何炳棣,巫仁恕. 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2).
- [15] 倪玉平. 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J]. 江苏社会科学,2002,(1).
- [16] 张凤琦. “地域文化”概念及其研究路径探析[J]. 浙江社会科学,2008,(4).
- [17] 王 韬. 大运河的文化意象[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
- [18] 卢 勇,冯 培. 20世纪以来大运河水利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J]. 中国农史,2019,(5).
- [19] 李永乐,孙 婷,华桂宏. 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规律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2021,(2).

<sup>①</sup> 李永乐、孙婷、华桂宏:《大运河聚落文化遗产生成与分布规律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